

沧桑文丛
主编 ■ 李辉

残破的 世界

火星 著

火星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 李辉

残破的世界

火 星 著



CANGSANG WENCONG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破的世界/火星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5

(沧桑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5-04647-8

I. 残… II. 火…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78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176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15.00 元

“沧桑文丛”总序

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

沧桑是时间的流动。昨天、今天、明天，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条河流的水，尽管来自不同山川，一旦流在一起，便浑然一体，无法将之一一分开。

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同一个时刻，同样的阳光照耀下，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

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在他的心灵世界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或者说，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思想、人生一种

沉甸甸的分量。

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沧桑”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社会的变迁。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回首往事,抚摸流逝的日子,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处在世纪转折时刻,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他们知道,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

主编一套“沧桑文丛”的构想,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

“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题材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

不猎奇,不虚饰,历史的真实应该是“沧桑文丛”的灵魂与品格。

重要的当然在于,文丛中的作品,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

记录。我相信,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才是“沧桑文丛”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

愿这样一套丛书,以它独有的姿态,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

李 辉

1997年1月28日



开场锣鼓—— 干校的日日夜夜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从 50 年代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就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卷进了大大小小的政治漩涡之中。这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瘾头参预政治;想藉此步入仕途的毕竟是少数。但是,你不想干预政治,政治却要来干预你;你越是逃避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它越是要来清查你,批判你,直到把你与政治捆绑在一起,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大概就是“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吧。

我在北京大学度过九年的读书生涯,就参加了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四清”运动,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充满火药味的、群众斗群众的政治风暴中度过的。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参加整班内所谓“右派”同学和有“右派言论”的同学。这些同学因其档案内被装进各式各样的黑材料,大半生遭受着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有的迄今还下落不明。而我在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夏之交的反右倾运动中也挨了整,受了处分,说我是“漏网右派”、“右倾分子”,

尝到了挨整的滋味。1964年夏至1965年,我和研究生班的同学,到湖北江陵县参加农村“四清”,整了农村大队和小队的干部。那时候,我们不是整人就是挨整,“斗争哲学”就是如此简单而机械地循环着。

1965年秋,我被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11月上旬,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呛人的火药味迎面扑来,预示着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即将席卷中国大地。196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以后,爆发了造成全民族空前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不是三分之一的时间,而是百分之百地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沉浮,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无可奈何花落去。”正当我们踌躇满志,要在事业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时,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把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剥夺去了。如今垂垂老矣,留下的只有空虚和遗憾。要“舒愤懑”吧,时隔三十余年,“舒”它又有什么意义呢?空有抑郁心头的愤懑折磨着自己。

我一向以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就其精神价值而言,恐怕不亚于一座万里长城,也不亚于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它可以让子孙后代知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享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大地上,曾经重新捡起秦始皇、法家的衣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发生了摧残人性、屠杀生灵、毁灭文化、制造迷信的可怖的一幕。

我任教不满一年,“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广播学院一些造反派学生,在大饭厅前贴了我满墙的大字报,上纲上线,无中生有,侮辱人格,充斥着恶棍、流氓的气息,令我惊诧。如说我是“北大陆

平(校长)的徒子徒孙”,“北大暗藏在广播学院的定时炸弹”,“长期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修正主义黑苗子”,“漏网大右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大字报还揭发我“长期隐瞒家庭成份”,诬我是“华侨大地主兼大资本家”的、“洋人豢养”的“狗崽子”。

三五个造反派头头还气势汹汹地闯进教研室,勒令我交代与陆平的“黑关系”,交代与茅盾的“黑关系”,并交出茅盾给我的“黑信”等等。

这是很可笑的。陆平是校长,我是学生(万人中之一分子),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黑关系”从何交代?再说,我发表过评论茅盾短篇小说的文章,与他通过信;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我是一名研究生,一个小小老百姓,我和他能有什么样的“黑关系”?而且,茅盾还未被上面定为“黑帮”,我还有权利保存他给我的信。不过,因为我拒绝交出“黑信”,难免要遭一点皮肉之苦。

根据造反派罗织的这些“罪状”,我被揪出来了,揪去与“走资派”、“牛鬼蛇神”们敲破脸盆游街,一起被监督劳动,一起被关进“牛棚”,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

读罢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我想,倘说季老当时是北大东语系系主任,又是“反动权威”,根据《十六条》^①的规定,被揪斗、关牛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学教员,这该怎么说呢?

拦腰说起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的长文,引述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五七指示”,并指出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走五七道路是广大机关干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由之路。那时,高校自1966年已停止招生,我们除了跟随学生斗“走资派”、斗“牛鬼蛇神”和打派仗以外,无所事事,无所适从,盼望着早日到五七干校这座“大熔炉”里去锻炼和改造。但是,因为学校还有1965年招进的外语系、新闻系、无线电系近四百名学生,他们刚进入第三学年,不可能跟随教职工去五七干校,所以还要等待一些时日。

1968年秋,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人民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军宣队)二十余人进驻广播学院,给学院两大派——“北京公社”(属北京市以航空学院为首的“天派”)、“红三军”(属北京市以地质学院为首的“地派”)的头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制止武斗,随后领导全院师生进行“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斗、批、改”中,穿插着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成立“走资派专案组”,并在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基础上,成立全院的“革命委员会”。此外便是开展形式主义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如早饭后一小时的“天天读”,面对毛泽东的肖像,

手持《毛主席语录》，如教堂内的信徒一般，早晨“早请示”，晚间“晚汇报”——很像是“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以及无休止的“斗私批修”会。

值得一书的是开展“三忠于”（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活动。那时由教务处、图书馆等一些不甘落伍的中年女教职工带头，买了几块红布和几小捆橙黄色的丝线，日日夜夜精心地绣出了在一个“♡”内有各种形体的“忠”字的大小锦旗。后来外语系、新闻系的女教职工也闻风而动。这些锦旗，是献给军、工宣队和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在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天，礼堂的主席台上，两旁的墙壁上，挂满了锦旗，琳琅满目，五彩缤纷。我们男人们和不会刺绣的女人们，由文娱骨干分子指导，冒着刺骨寒风，在操场上虔诚地、认真地练习跳“忠”字舞，我也在其中。待到开庆祝会那天，我们排成两行，手持语录，从操场又跳、又扭进入礼堂。人们脸上都挂着笑容，虽然扭得难看，总比挨批斗要舒坦得多。约有一周时间，从早晨到深夜，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整个学院像庙会一般喧闹沸腾。但是，我从相当多的教职工不自然的神态中，仍可窥视出他们内心的惶遽，因为笼罩在学院上空的恐怖的浓雾并未被驱走。拿我自己来说，白天规规矩矩地在操场上练跳“忠”字舞，晚间在家里则偷偷摸摸地把五六百本“封、资、修”的书，装进几个纸箱，再次转移到好邻居——中央广播事业局器材管理处罗同志家里。这第二次的战略转移，与第一次不一样，不是怕抄家，而是因为1969年3月间，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多起军事冲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战争一触即发。风闻即将疏散，我的妻在北京曲艺团工作，也会疏散外地，家室无人，转移是为疏散作准备的。

张庄避难

我根据道听途说作出的正确分析,好像很有几分先见之明。果然,在紧张的临战气氛中,1969年8月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了加强战备的指示,不久林彪发出“第一号命令”,我的妻跟随北京曲艺团先走,疏散到北京郊区南口村;我随广播学院约三百名教职工和近四百名推迟毕业的毕业班学生,在军、工宣队领导下,疏散到了河北省望都县张庄公社。

张庄是一个大乡,分上庄、下庄,亦叫东庄、西庄,有一千多农户。学院七百名师生,分散居住在老乡家里,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整党以后,我很荣幸被吸收为“走资派专案组”成员,与一位政工干部住在耿国志家里。耿国志夫妇及其老母住东厢房,我们住西厢房。

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是平原游击队出没的地方;耿的大哥抗战期间就在这块土地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在这里感受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农民憨厚、本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傍晚,炊烟袅袅,庄稼汉们手捧大饭碗围坐在槐树下边吃饭,边闲谈天;晚间,偶尔还能听到悠扬的笛声和二胡声。他们置身于田园牧歌中,好像不知道在神州大地上已是“天下大乱”。

我的房东耿大娘,终日坐在古老的木制的纺织机前纺织土布,和谐而有节奏的“咿咿呀呀”的织机声,“呱嗒呱嗒”的穿梭声,构成了一曲美妙绝伦的无标题音乐。

然而,在张庄避难的学院师生,却仍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中

整人和挨整。毛泽东于1969年7月再次发出继续做好“斗、批、改”的指示,因此,军、工宣队一方面狠抓对“左、顾、聂走资派”的批斗和专案审查;一方面抓紧清查两派学生头头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这类审查、清查和批斗,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逼、供、信的不正当手段;即使由军、工宣队组成的指挥部发现以后,也并未完全加以纠正和制止。因为上面有人说,“群众运动是天然的合理的”。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原本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却也搅得师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那时上面很注意抓“带胡子”的,所以我们这些有胡子的教职工,平时不敢同学生(尤其是派头头)接触,深怕被他们“咬”成“五一六分子”而遭来横祸。因为按照既定的百分之五的坏人比例,在全院师生中,指挥部总要抓出一二十个“五一六分子”,才好向上交差。倘若你一个清白人被揪出来凑数,岂不冤哉!

至于在张庄批斗“左、顾、聂走资派”,比起运动初期,应该说已经文明多了。批斗时,他(她)们不用再戴纸糊的高帽,也免去了“喷气式”,不过脖子上仍然要挂一块大纸牌,以示各自的身份,仍要罚站两三个小时。最有趣的是,在指挥部忙着清查两派学生的“坏头头”和“五一六分子”,“走资派”得到几天的间歇和宽松的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叫嚷道:“不能让走资派太舒服了!”于是,不管是否必要,革命师生随时都可以把“走资派”拉出来批斗一番。这很像是马戏团的街头演出,在精彩节目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临时牵几只猴子出来耍一耍。

我是“聂专案组”成员。聂的“罪行”,除了“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击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学生”外,尤为严重的

是她的“混进党内近三十年”的“假党员”问题。这个问题,“北京公社”一些学生曾经去聂的家乡索取了几份证明材料,原以为可以定性,开除聂的党籍。但是,指挥部认为,派性调查不能算数,必须重新取证。于是决定派“聂专案组”组长和我,于1970年1月春节前夕火速往山东泰安一带老区,向一些尚健在的老游击队员访问、调查。我将在后面详述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怪现象——能够证明聂的党员身份的外调材料被销毁,而证明聂的“假党员”的外调材料被取回的怪现象。回张庄以后,在指挥部召开的一次专案人员会议上,我如实反映此次外调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对聂专案的一些看法。会后,指挥部分管专案工作的军宣队某代表,批评我立场不坚定,没有与聂“走资派”划清界限。那意思我是明白的,我不够“左”,在办案中犯有右倾错误,属不可靠分子。果然,这年夏天,去五七干校前夕,指挥部把我从专案组清洗出去,从此我交上了华盖运。

1970年6月,四百名毕业生耽搁了一年以后被分配到农场劳动,几个“五一六嫌疑分子”留校继续接受审查。那时的形势,中苏战争似乎打不起来,或者说还没有马上交战的迹象。因此,7月间,根据上级(中央广播事业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示,我们结束了张庄避难的生活,打道回府了。

奔 赴 淮 阳

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五七干校,在河南省周口地区淮阳县。广播学院属广播局领导的部委院校。因为学院已停止招生,而且风

闻已决定停办,从张庄撤出后,三百多名教职工理所当然的要到淮阳五七干校,一方面进行劳动锻炼和改造,一方面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话要从头说起才说得清楚。对历史作浮光掠影的回顾,是必要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某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要人,突然光临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在礼堂向革命师生作报告。我那时已被关进“牛棚”,与“黑帮”、“牛鬼蛇神”为伍,当然没有资格聆听“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不过,后来从一些“红卫兵”贴出的大字报中得知,江青在讲话中说广播学院是“彭真的黑据点之一”,并传达了据说是“最高指示”,说广播学院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因此这位婆娘是带着使命来“点火”的,号召革命小将迅速行动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摧毁这个“黑据点”,烧掉这座“小庙”,抓出大大小小的“王八”。霎时间,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不过,听几位教职工窃窃私语,似乎不敢相信既不起眼儿、又无名分的小小广播学院,怎么会是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大人物的“黑据点”?他看中广播学院的哪一点呢?至于“王八多”,这是一个“模糊数字”,有多少只就抓多少只吧。

据说,江青等“中央首长”私下还煽动“红卫兵”小将进城去造中央广播事业局梅益、丁莱夫等“走资派”的反。现在想来,这后者大概才是几位中央首长在百忙中光顾“小庙”的主要动机。

几天以后,中央广播事业局派来的李、王“工作组”靠边站了,成了批判对象,说他们执行的是镇压群众运动、包庇“走资派”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学院内大搞“白色恐怖”等等。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批判“工作组”的，有揭发“黑据点”的。其中一张醒目的大字报，开列了大大小小近五十名“王八”的名单。我也在名单之列。此时全院师生员工一千余人，按照百分之五的坏人的比例，近五十只“王八”不算超标。

北京市许多高校的“红卫兵”小将，无所事事的教职工和一些爱凑热闹的市民，纷至沓来，观看大字报，声援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约有一周的时间，成千上万的人流，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把这座“小庙”挤得水泄不通。广播学院靠中央首长的光顾而扬名了。

“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黑据点”云云，已经充分说明广播学院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派来的“工作组”是“捂”阶级斗争盖子的。现在，经中央首长的关怀和支持，“红卫兵”小将再次抡起“造反有理”的“千钧棒”，要来“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广播学院的一切矛盾和斗争，我认为基本上是遵循着这一指示精神开展的。

政治往往搀和着个别人的主观随意性，它并不需要根据客观情况得出科学的结论，也不需要权势者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监督。江青一席话，转瞬之间就改变了广播学院的性质，判定了广播学院的“死刑”，多少人也因此在劫难逃。

话说回来，既然这里是“黑据点”，是“神灵大”、“王八多”，招降纳叛、藏污纳垢之地，下干校之前，军、工宣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先是找部分左、中、右不同类型的教职工个别谈话，“思想摸底”，“分类排队”；然后是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全院三百余名教职工学习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的信的简称。该信说，“军队是

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后来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创造发明,便演化成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五七干校”,成了知识分子炼就一颗红心的“大课堂”)。

一个多月的学习班,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归纳起来,大略以下三点:(一)五七干校是改造和磨炼知识分子的好地方,在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中把自己改造成工农群众所需要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严重脱离工农群众,书读得越多越蠢;下去滚一身泥巴,沾一脚牛屎,才可能脱胎换骨,实现立足点的转移。(二)“脸朝黄土背朝天,抬头莫忘看路线。”到了五七干校,再苦再累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路线斗争。“亲不亲,路线分”嘛。(三)继续搞好“斗、批、改”,继续审查“左、顾、聂走资派”,继续清查“五一六分子”,要把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挖出来。消除隐患,保卫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8月初,办完学习班,军、工宣队撤离广播学院,只留下几位军代表负责护送我们到淮阳五七干校;此后便是广播局“军管会”派往干校的“军管组”来“管”我们了。

除了二十余名行政人员被指定在“留守处”看守空空荡荡的校园以外,8月下旬,近三百名教职工,包括老弱病残者,草草收拾行装,便乘京广线列车南下河南省漯河市。抵漯河后,随即改乘大卡车直奔淮阳五七干校。因行程匆匆,我连与下放京郊南口的妻子告别都来不及,只寄去一简信告知,免得以为我“失踪”了。

广播局“军管会”何以选择淮阳作为校址呢?那时有的书生一听说是去淮阳,高兴得蹦跳起来,连忙翻检史书,查看地图,以为淮